

中日“跨世纪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学术研讨会论文

编者按：1997年9月9—10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联合举办的“跨世纪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北大勺园举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梁守德教授、副院长潘国华教授、方连庆教授，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部长加藤节教授出席开幕式，梁守德院长和加藤节学部长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龚文库教授、叶自成教授、林代昭教授、潘维副教授、许振洲副教授、唐士其讲师；日本成蹊大学加藤节教授、植村荣治教授、龟岛庸一教授、中村民雄教授、西崎文子副教授。这次会议是双方联合举办的第六次学术会议。会议围绕中西方文化交流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加深了相互了解，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期间，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道教授亲切会见了与会代表，并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为扩大学术交流，本刊现将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按发言顺序予以发表。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中国 21世纪的社会发展道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叶自成

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世界大国，在向21世纪迈进的时候，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无论什么样的观点都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及其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影响这一大的框架。

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观点是全球化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相融合的道路，不管中国走的道路有多么不同，也不管中国的道路多么有中国特色，但中国迟早都会融入到国际体系中去，与西方世界接轨。中国将成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成员。所以今后中国的主要问题是

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实际上还是西方文化中心论。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学习西方已经学习了一百多年了，中国全面的学习了西方的各个方面的好的东西，但现在西方文明面临巨大挑战，西方文明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东亚在二战后，特别是在70~90年代的发展表明，一种新的文明正在形成，它在21世纪有可能超越西方文明。因此，中国在今后的时期中，向西方文明学习已经不再是中国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它的重点应放在挖掘东方文明的传统历史价值观上，使它现代化，使它发展成为一种能超越和取代西方文明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它实际上是东方文化取代论。

本人认为，无论是西方文化中心论还是东方文化取代论，都不能成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指导思想。我还认为，在今天来讨论东西方文明的关系，应超越过去中国思想界曾经发生过的“体”“用”或“本”“末”之争，既不赞成“中体西用”，也不赞成“西体中用”，而主张完全的融合论，三位一体论。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尤其是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曾经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过自己的光辉篇章的大国，应当在社会发展道路上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但要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继续学习西方，同时也发掘、整理、革新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即把学习吸收西方文明中的精华和发展东方价值观念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东西方并重，在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中实现两者的高度的融合。而这里的西方文明，既指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也指西方的社会主义文明，再加上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东方文明，实际上是三位一体，三者的大交流，大融合。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着眼于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而继续进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学习西方文明与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的三次高潮

中国近代的发展史证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不能回应西方工业革命对中国的挑战，在日新月异的西方文明的发展面前，中国的传统文化显现出自己的落后性。学习西方文明成了近代中国的主流。但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中，有远见的中国人也开始了在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文明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

如果说直到20世纪初，全盘西化，以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为模式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发展进程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的话，那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暴露出其自身的巨大的弊端，中国的文化发展的主流有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从完全模仿和崇拜西方，转到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意义，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上来。在20世纪20年代，不少曾经主张完全学习西方的思想界的领袖，开始对西方的文明采取批判态度，开始了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第一个阶段。其中一些人如梁启超等，从全盘西化转到了西方文化已经破产，中国东方文化在未来的时代中将高于西方文化的论调。他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他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完全不同于过去。他提出以西方文明来补中国文明的不足，西方文明成为中国传统文明的一种补充，已经处于次要地位。梁漱溟在1921年写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也把中国文化视为比西方的物质文化更高的精神文化，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①。连一向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也无意中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在这一时期，许多思想文化界的有识之士都提出了要把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观点，认为只有使中华民族恢复其“自主性”，才能吸收和消化外来

文化而不被外来文化所征服。他们指出，外来的东西，“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我们要‘中国化’，要适应着自己的需要，把世界上许多好东西都融化成自己的”，“所谓‘中国化’者，只是世界性的文化，经过中国民族的消化，而带上一种特殊的中国味道而已”，它“从一方面说，的确是世界的，从另一方面说，又彻头彻尾，道道地地是中国的”^②。

这一时期探索中国道路最杰出的代表是孙中山先生，他在20年代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他在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时认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但学习西方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与欧洲的大不相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③。孙中山把西方的文明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了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核心的理论主张。这是这一时期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一大成就。

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索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在经历了全盘苏俄化的巨大失败后，毛泽东等人在30年代开始了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第二次探索。这次探索的结果，是在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必须“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④。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形成了与苏俄革命不同的道路，并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学习外来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第三个高潮，其重点是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它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建国之初，中国的社会主义再次全盘苏俄化，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到1956年时，中国共产党再次开始了新的探索。1956年中共八大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的一步，开始以中国国情为基础来思考怎样进行中国的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但后来毛泽东未能在这一条正确的路上走下去，偏离了他原来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的思路既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的东西，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不同，与西方的价值观念相差更大。在1978年后，邓小平开始了新的探索，并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实质上是怎样改革原来较多地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形成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怎样把社会主义的原则与西方文明中的先进成果相结合，怎样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这次新的探索形成了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

从以上论述可见，虽然在不同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道路，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近百年的时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一条明确的脉络贯穿始终，那就是要在吸收西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果的基础上，寻找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发展道路。这一思想的主流和实质，都是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为其出发点的。这一条近百年形成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还会深刻地影响今后中国走向21世纪的思想主流。

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潮：一种是从梁启超、梁漱溟思想观点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现代新儒家思想，其基本的思想倾向是，

学习西方思想应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为本位，在社会发展道路的模式上强调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尊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价值体系；第二种思潮的主流是把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主要建立在西方的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上；第三种思潮则主张，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应建立在既吸收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也坚持从西方引进过来并已在中国扎根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两者均应与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

二、吸收西方文明成果仍然是中国探索 21 世纪社会发展道路的基础

前面三种思潮的共同之处是都承认中国有必要向西方文明学习。看起来向西方学习是中国文化交流中的题中之义，是必然的和自然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虽然在现在没有什么人公开提出不向西方学习，但实际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许多不同的认识，有一部分人对学习西方不是那么自觉那么认真，对此持有疑虑。一些受过去的传统的“帝国主义”论影响较深的人，或多或少地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腐朽，西方文明中的根本矛盾引出的各种弊端已经积重难返，迟早会把西方引入灭亡的深渊。

更多的人则从较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和进程之后，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实力，并在 21 世纪必将不可阻挡地成为世界大国的情况下，中国是否还有必要把向西方学习作为一个主要的口号提出来？另外，在西方文明本身也为种种问题所困扰的背景下，西方文明到底还有多少可学之处？再者，即使西方文明中仍有许多东西是很好的，但中国国情与西方文明的背景相距太大，许多是要学也学不来的，又有多少东西真正可以移植到中国来？

的确，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它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豪感。虽然这些成绩是与开放，与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管理人才、西方的资金等联系在一起，但综合国力的增强也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新的盲目自大的情感。一方面在中国可以对西方说“不”的情感中，包含了因中国的强盛而产生的扬眉吐气的心情，一扫一百多年来因受西方欺凌和侮辱沉寂在胸的自卑感；另一方面，在可以说“不”中又隐隐约约地包含了拒绝再学习西方文明的过于乐观的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过低地估计西方发展的可能和潜力。这其中包含着一种危险的情绪。

因此，有必要明确而坚决地指出，学习西方文明中的长处和先进成果，仍然是中国探索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的主要任务。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学习西方文明，如果从 1840 年算起，虽然已经有近 160 年的历史，但其间几经曲折和磨难，受到较大的干扰，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不能算彻底。首先，它一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的阻力，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始终在进行斗争和较量，其中既有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对外来的西方文化中的糟粕的抵制，也有中国文化中的落后的成分对西方先进文明的顽固的拒绝；其次，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进程也受到了来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欺辱的干扰，这既指西方列强把一些与中国国情不符合的东西通过武力强加于中国而受到中国的抵制，也指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战争，把巨大的灾难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使相当一部分基层群众，对一切来自西方的文明，不论其好坏都一概加以拒绝；再其次，它受到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而传统社会主义的消极因素的一个

表现，就是否认资本主义有任何可学之处，对资本主义的大部分文明成果，都抱有否定态度，这种立场虽然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克服，但它至今还对相当多的人有影响。由于这三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其进程一直是较为坎坷的，也影响到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整个进程。

第二，对什么是西方文明中的长处和优秀成果，并没有一个较为理性的认识，往往是从实践需要出发，取其所需，对西方文明本身也缺乏一个透彻的了解和认识。这使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方面，对西方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到底有那些可学，那些不可学，并不清楚，或者对它的了解是支离破碎的，不完整的，实用主义色彩较浓，这些年来虽然在这一方面有改变，但基本来说，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还是侧重于物质方面。所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是差不多了，而是需要从表层向深层发展，尤其是在现阶段，在建设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在建立和完善与之有关的法律制度、人事制度等方面，学习西方的文明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那么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了。

第三，学习西方文明也必须从动态的角度加以考虑。说学习西方文明差不多了，主要是从一种静态的立场来思考这一问题，把西方文明视为一个静止和不再发展的对象。而实际上，西方文明在二战后，尤其是在信息革命时代，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从今后更长一个时期来看，尽管它的问题和矛盾很多，内部也潜伏着危机，但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西方文明已经或马上、立即、开始没落，它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改进的潜力。我们过去用来证明西方文明没落的一个证据就是西方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发展缓慢，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的经济文明就一蹶不振。美国在克林顿上任后，经济不断有所增长，已经连续 75 个月处于增长势头。考虑到美国经济规模较大，所以美国经济每增长 4~5%，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并不亚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国家的快速增长。因此，不能自我沉浸在中国经济每年增长 10% 这一表象上。而且，美国在科技、经济、军事力量对比上与其它大国的差距在扩大，而不是缩小。尤其要看到，在高科技年代，中国在这一方面发展虽然不慢，但与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说什么中国学习西方已经差不多了，西方文明已经没有什么可学了，这样的观点实在是肤浅的。因此，中国在迈向 21 世纪的时候，在探索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方面，应当继续把学习西方文明中的先进成果，作为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发掘东方的价值观念与探索新的社会发展道路

在指出必须把学习西方文明作为中国今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任务之后，我们还要把发掘和整理、改造和发展中国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念作为探索中国面向 21 世纪的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其中的必要性，既可以从西方文明不足以成为普世的模式的角度，也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的价值体系越来越显示其巨大的现实价值的角度来看。

西方文明虽然在二战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克服其固有的矛盾和问题上有一些进展，但从根本上来说，西方文明本身所包含的问题和深刻的矛盾是西方文明的模式所不能解决的，而且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西方文明的模式也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世界文明的唯一模式。

首先，是从西方文明国家本身的问题来看。西方文明发展到现在，许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是日益发展，成为西方社会去不掉之大疾。美国总统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谈到西方社会的典型美国的问题时，深刻地指出，美国是个纵欲无度和精神贫乏的社会。在他列举的困扰美国社会的 20 个大问题中，有许多是西方社会的通病。其中最重要的有：社会财富的极不合理的分布，其中最富的 20% 的人口拥有 46% 的财富，而占总人口 20% 的穷人只拥有全国财富的 3.8%，美国有 357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这在一个人均拥有国民财富居世界前几位的社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在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同时，在最先进信息时代的国家中，精神的空虚也令人震惊，这表现在三大问题，即广泛的暴力犯罪，美国的杀人犯罪率居世界之最；毒品泛滥，每年用于毒品交易的钱高达 1000 亿美元；最后是色情泛滥^⑤。

第二，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基本情况不允许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模仿西方文明。即使西方社会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没有上述矛盾和弊端，也不能使之成为普世的模式。因为西方文明所建立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高消费的基础上，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高度的索取的基础上，纵欲无度的生活方式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挥霍无度。如，能源的大量消耗是西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美国 2 亿人口，每年消耗的石油为 4 亿吨，美国人一年消耗的能源占到世界能源总消耗量的三分之一，人均每年消耗 2 吨。同样，美国一年向大气层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占到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若中国也照这样的模式生产和生活，则 12 亿中国人一年就要消耗能源 24 亿吨，相当于现在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 2 倍，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将使现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再增加二倍。此外，对粮食、水、各种矿藏的消耗也将如此，照这样下去，世界的资源用不了多少年就会陷入困境。

第三，西方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建立在科技的高度发展基础上，但现在西方社会似乎已进入科技发展失控的状况。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也是人类今后进步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但人们在享受科技为人类提供的巨大的好处和利益的同时，也正在为科技的近似疯狂的发展付出巨大代价。

科技的高速度发展产生了三类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科技力量使人类不断战胜大自然，人类有更多的手段统治和奴役自然，从自然界索取更多的东西，给大自然制造更多的垃圾和废物。二是它使人类的生存面临新的危机。它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休闲时间更多了，但又使人类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变得更快更紧张，人的身心似乎更疲惫；物质财富更多了，也为人提供了创造精神财富的更多的手段，但人类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更丰富，反而产生了精神空虚症。它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交流、亲近和彼此接近的机会和可能性，但也割断了人们交往的自然的渠道，人们在电视、电话、电脑面前变得更为封闭，更为孤独；人的器官移植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人脑的移植，甚至动物器官向人体的移植将会使人这样发问：我是否还是我？而机器的高度智能化和拟人化的发展，电脑人格化的发展，动物器官向人体的移植，早晚会使人思考：人与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在那里？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以及遗传工程和克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终会使人类提出人的生命意义何在的问题。三是科技的高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一系列的重大问题：由于科技发明为利益所驱动，促使科技无节制的发展，人类社会早晚会为少数有天才的科学狂人拖入灾难的深渊；高科技的发展也为犯罪提供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手段，原子弹、剧毒物品以及其它先进武器和先进技术设施用于犯罪、走私和恐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面对这一切，西方文明社会似乎显得无能为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必须要超越西方文明，超越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寻找一种能弥补西方文明不足的新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明，日益向世人显示着自己的高度智慧的光芒，越来越引起世人的重视。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曾为世界奉献出许多伟人，他们用他们的高度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内心世界的修炼等方面，为世人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成果。这些东西固然不能取代西方文明，但对于弥补西方文明的不足，对创造一种摆脱和超越西方文明模式局限性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却具有极其重大的启迪作用。

过去人们对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作用谈得较多，这自然是符合儒家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思想主流这一历史地位的。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又并不局限于儒家。下面仅从老子的两个基本思想来稍加论述。

1、西方文明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也是崇尚物质、崇尚金钱的功利主义的文明，是促使人们去追逐物质利益的文明。老子的哲学思想却把人和人本身的修养，把人的内心世界的完善和人格的自我完善看得至高无上，认为身重于物。老子指出，人们应“不尚贤（名利），不贵难得之财”，因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财富与名利，如“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尤其不能纵欲，因为欲海难填，永无止境，最后必为欲所伤。与主张大量消费自然资源和财富的西方文明不同，老子对节俭的品德给予高度赞扬，认为“治人事天莫若啬”（啬即节俭），把它视为“重积德”，“根深蒂固”和“长生久视”之道。

老子认为，人应在物质之外去努力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人的幸福之所在。物只是人的生活中的一个方面，而人体的内在的精、气、神更为重要，为此人应当清静无为，顺乎自然，返朴归真，人的生活方式应是以适应自然为要，不应放纵情欲，逆自然之道而行之，纵欲终有欲穷之时，尽兴终有兴尽之日。在老子看来，这都是较低级的生活方式，而追求人内在的精气神的发展，追求人格的完善，是永无止境的，且其中隐藏无穷乐趣，能在“希声”中得“大音”，在“无形”中得“大象”，使人能“善始且善成”，品尝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2、老子的思想不仅认为在个人的生活方式方面应该顺其自然，而且主张人类社会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与西方文明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使人类征服自然、掠夺自然，使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特征是有很大不同的。

老子强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和谐。可以说，老子是人类思想史上较早发挥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观点的智者。在他的著作中，“道”与“自然”都是一个基本概念，它是天地万物的一个综合体，是一切事物的本源和基础，人也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当顺从自然的规律，而不应当违反自然的规律。“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如果人类违反自然规律，就会招致凶险的结果。这句在几千年前讲过的话在今天听来，象是对今天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和环境污染为代价，拼命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文明模式的一种严厉的警告。“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认为贤明的人只是辅助万物生长和发展，而不无故妄为。在这个基础上，老子提出了“知和曰常”的观点，认为人类自然的“和”即“和谐”视为一种根本的“常”即“规律”。这一思想正是人类社会所极为需要的。要做到“知和”，就必须“知止”，即做到人类从自然界索取的界限，“知止可以不死”，知道了这一点，人类就可以避免危险。在老子论述他的建筑观、保健观和养生观时，都贯彻了人与自然高度和谐，自然无为的

基本思想。

老子的这些思想所包含的深刻的含义已为西方许多有识之士所认识。当代西方著名的物理学家 F·卡普拉 (Capra) 曾说：“在伟大的诸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是最完美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⑥，日本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在谈到老子思想对现代的意义时说：“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将达到的状况。……我们现在不得不担忧人类会不会沉没到科学文明这种人造的第二自然中去。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声明获得了新的和威胁性的意义，……使人感到惊讶的是，生活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某一时代，老子怎么会向从近代开始的科学文化提出那样严厉的指控”^⑦。

在过去，人们对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果与整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成果是作为两个分裂的过程来进行的，今天人们应当从探索人类的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新的文明的角度，把两者高度一致的结合起来，把它们视为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和两个组成部分。如果说过去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的重要意义估计不够的话，那么今天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更高的地位上去。可以大胆地说，21 世纪的人类文明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借鉴中国东方文明的智慧宝库。

四、东西方文明融合是中国探索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必然趋势

现在在中国发挥影响和作用的三种文明，无论哪一种都不能单独成为 21 世纪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独一因素，但若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种，也无法形成新的比现有的西方模式更好的新的模式。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虽然如上所述，在未来的世纪中将继续有所发展，但它的局限性使它不能成为普世文明，若世界各国都按这一模式发展，那将是人类的一场灾难。

起源于西方的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它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如社会公正，国家和社会对生产消费和分配的调节和监控，对广大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将在 21 世纪继续发挥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已经在苏联东欧宣告失败的现实社会主义的试验，还是在欧洲仍起主导作用的民主社会主义，都没有解决公有制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大，政治腐败等问题，它只是为取代现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提供了某些素材，指出了一些基本的方向，但未能提供一种可以完全取代现有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完整的模式。而且，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现有的社会主义，都没解决政治制度产生腐败的问题，也没解决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对抗和矛盾状态，在过去苏联东欧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对大自然的掠夺，对自然资源的浪费，甚至比资本主义更严重。

中国等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文明相比较，在总体上是落后的，它所倡导的严格的等级尊严，安贫乐道和知足常乐的惰性思维，重伦理和个人修身修道，经济和科学实践，人在大自然面前的过分消极的态度等，使它难以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的立国之道。但它所竭力倡导的天人合一，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对人格修养和道德品质的高度重视，对人与人的自然的关系，对个人——家庭——国家——社会之间关系，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想，在人类社会迈向 21 世纪之时，对人们超越现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局限而探索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确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同时，这三种不同性质的文明，在中国已经是同时存在，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其它两种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先后经受了外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强大冲击，充分表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将长久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在中国产生影响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总结了文革时期与资本主义对着干和完全排斥资本主义文明的沉重的教训之后，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优秀和先进的成果是普遍接受的；而社会主义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的指导性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吸收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还是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都是在这一框架内进行的。三者的这种并存共处，在一种制度下大交流和大融合，并各自在不同领域同时发挥重大作用的局面，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三者之间有矛盾，有冲突，但相互之间各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也有很强的互补性：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在社会制度层面，在实现社会公正和调节方面；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人的伦理道德方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在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市场经济，形成法制和民主制度，在鼓励个人进取和主动性方面，都各有其较强的适用性。

所以，21世纪既不是西方文明没落的世纪，也不是“河西文化”即西方文明独领风骚的世纪；它不是东方文明继续屈从于西方文明的时代，也不是“河东文化”即东方文明取代西方文明的世纪，而是东西方文明相互补充、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时代。

西方的一些学者，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谈到中西文明的融合时说：“或许唯科学主义……这种认为只有科学真理才能认识世界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欧美人的毛病，而中国的伟大贡献或许可以通过恢复基于一切人类经验形式的人道主义社会准则，而从这种死亡的躯体上挽救我们……，想来没有比欧美和中国文明的合流更伟大的。依我的感觉，我们愈是研究它们的两方面，愈觉得他们象由两个不同的作曲家所作的两章不同的交响乐，其主调本是一样的”^⑩。

而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交流，将尤其显著地在中国显示出来，因为在西方，大多数人对东方文明并没有多少深刻的理解，只有少数汉学家对以东方文明中的精华来弥补西方文明的不足有所认识。因此，西方国家除了引进一些东方文明中的外围文化如歌舞、服饰、饮食文化产品外，很难将东方文明中的核心部分与西方文明融合。但在中国，大规模大范围地引进、学习和吸收西方文明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对西方文明中许多重要的价值观念已有相当的理解，并已有相当多的东西被融合在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中国的东西，现在，人们对西方文明的长处和短处都有较系统的理性认识，在这样的基础上，最有可能实现东西方文明的深刻和高度的融合。

此外，在学习外来文明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也有能力在外来文明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使之与本国国情结合，从而创造出一种源于斯而优于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局面。中国从印度引进了佛教，又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上加以融合，使大乘佛教中国化，使之带上浓厚的中国色彩，并在这一方面超越了起源地印度本身的大乘佛教，在很长时间中都是这一佛教流派的中心；中国从日本和俄罗斯引进了社会主义思想，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创造，当社会主义制度在其起源地俄国遭受到重大挫折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如异军突起，以其改革开放的成就让世人瞩目，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超越了原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地，在实行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文明与中国的传统价值相结合，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在经济

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⑩。尤其是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超过了对它进行殖民统治的英国本身。这样，中国已经有了把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价值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验，也有了把西方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的大陆的经验，再进一步，通过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成果和长处结合的方式，把三者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应当是较容易做到的。

东西方文明在中国实现大融合的另一有利条件，是中国所在的东亚各国都有一些把西方文明与东亚文明相结合的实例。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有日本本国的特点而不同于西方，而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也有所表现。所以中国把东西方文明进行大融合，在东亚并不是第一个，而只是东亚整个地区亚洲文明复兴和发展浪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可能得到其它东亚国家的同情和理解。

最后，有利于中国实现东西方文明大融合的条件是，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向海外派出10多万留学生，他们主要在西方学习，这对进一步沟通和了解西方文明并使之与东方文明结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选择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发展道路，会得到在海外的几千万华人的支持，他们在这一进程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本人认为，中国在21世纪把东西方文明融合起来，探索一种比现有的西方文明更好的社会发展道路，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也将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贡献。

注释：

- ①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 ② 同上，第406、588、638页。
-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0页。
-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4页。
- ⑤ 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文版，第113页。
- ⑥ 参见葛荣晋主编：《道家与现代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 ⑦ 同上，第303—304页。
- ⑧ 《李约瑟文集》（中文版），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页。
- ⑩ 参见 Wei Wou, *Capitalism: A Chinese Vers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1.